

欲变化气质
须先立坚卓之志



曾国藩传世经典

【清】曾国藩原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

曾国藩

处世
宝典

挺经

解读



凡人才高下，视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，而日趋污下；

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，而日即高明。贤否智慧，所由区矣。

古人患难忧虞之际，正是德业长进之时，其功在于胸怀坦夷，其效在于身体健康。

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佛家之所以成佛，所争皆在大难磨练之日，将此心放得实，养得灵，有活泼之

胸襟，有坦荡之意境，则身体虽有外感，必不至于内伤。

曾国藩 《挺经》解读

(下册)

[清] 曾国藩 原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六、求才

——求人自辅，须知人才至难

■原文

求人之道，须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鹰隼之击物，不得不休。又如蚨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类相求，以气相引，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■解读

求人才的方法，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，像鹰隼击食物那样，不做到绝不罢休。又要像青蚨之有母，野鸡之有媒。以类相求，同气相引，这样，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。

■原文

求人自辅，时时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难，注时在

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钦敬，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？弟当常以求才为急，其冗者，虽至亲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■解读

求别人辅佐自己，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。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，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，我也只是平等对待，对他们不是很钦敬，以今天来看，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。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，至于那些无能的人，即使是至亲密友，也不应久留，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。

■原文

虽有夏药，苟不当于病，不逮下品；虽有贤才，苟不适于用，不逮庸流。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。螳牛不可以捕鼠；骐驎不可以守閫。千金之剑，以之析薪，则不如斧。三代之鼎，以之垦田，则不如耜。当其时，当其事，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。否则铍铍而终无所成。故世不患无才，患用才者不觝器使而适用也。魏无知论陈平曰：“今有后生孝己之行，而无益胜负之数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”当战争之世，苟无益胜负之数，虽盛德京无所用之。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，今老矣，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。

■解读

尽管有好的药物，若不对症病情，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；虽然是人才，但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，就不如去用差一些的人。质地好的木梁可以撞开城门，却不可用它去堵鼠洞。不可以用强壮的水牛去捕老鼠，也不可以用骏马守望家门。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，不如斧子好用。三代用过的传世宝鼎，很是贵重，但你用它开垦荒田，它还不如木犁。面对具体的时间、具体的事情，只要你用人恰当，普通人也可以收到神奇的效果。不然，分不开宝剑、锄头的特性，什么事情都得弄糟。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，而害怕不知道使用人才，量才而用。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：“现在有个后生，很懂得孝德，但不懂得打仗胜负的谋略，您怎么用他呢？”当国家处于动乱时期，如果用的不是掌握胜负之谋的人，纵然有大德，也是不能用的。我生平喜用忠实可靠的人，如今老了，才知道世上药物虽然多，也有治不了的病。

■原文

取人之式，以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。办事之法，以五到为要。以五到者，身到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、口到也。身到者，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，亲巡乡里；治军则亲巡营垒，亲探贼地是也。心到者，凡事苦心剖析。大条理、小条理、始条理、终条理，理其绪而分之，又比其类而合之也。眼到者，著意看人，认真看公牍也。手到者，于人之长短，事之关键，勤笔记，以备遗忘也。口到者，

使人之事即有公文，以苦口叮囑也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■解读

择取人的方式，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，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。办事的方法，关键是要做到“五到”，即身到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、口到。所谓身到，就是作为官吏对命案、盗案必须亲自勘验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；作为将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，亲自家看敌情。心到，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、小条理、起初时的条理、结束时的条理，分析它的头绪，又综合它的类别。眼到，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、认真地读公文。手到，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、事情的关键所在，勤作笔记，以防止遗忘。口到，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虽然已有公文，仍要苦口叮囑。

■原文

天下无现成之人才，亦无生知之卓识，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。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功可强成，名可强立”。董子曰：“勉强学问，则闻见博；勉强行道，则德日进。”《中庸》所谓“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”，即强勉功夫也。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，而乏才用之具。诚能考信于载籍，问途于已经，苦思以求其通，躬行以试其效，勉之又勉，则识可渐通，才亦渐立。才识足以济世，何患世莫已知哉？

■解读

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，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。人才大多都是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出来的。《淮南子》说：“功劳能够在强迫威逼下创造出，功名可以在强迫威逼下立起来。”董仲舒说：“努力地做学问，所知道的知识就会广博；努力地寻求真理，道德修养会日日进步。”《中庸》里所说的“别人知道一件事，你要知道一百个，别人知道十件事，你要知道一千个”的话，就是要人多做困苦付出的功夫。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，缺乏拯救社会的才略准备。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加以对证，再向那些已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学习，苦苦思索为世所用的办法，并亲身去实践，努力再努力，那么就可以通达识变，才识就逐渐地培养起来了。才识能够有益于社会，怎还能担心社会上不知道你呢？

■原文

无兵不足深虞，无饷不足痛哭，独举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、赴义恐后、忠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；或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郁不伸，以挫、以去、以死。而贪饕出缩者，果骀首而上腾，而富贵、而名誉、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为浩叹者也。默观天下大局，万难挽回，待与公之力所舛勉者，引用一班正人，培养几个好官，以为种子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■解读

没有兵士，不值得焦虑，军费匮乏，不值得痛哭，而真正值得焦虑的是，不能立即找到见利不争、义字当先、忠挚做事的人才。这种人才或许可以得到，但因为其地位卑下，往往因此而气闷不舒、受尽委屈挫折、罢免离开直至死去。而那些暴虐贪婪又善于钻营的人却因为占据好的位置，而长享富贵，拥有受人尊重的名誉，故此健康长寿而不死。这是我最为慨叹无奈的事情。静观天下大势，这种情况难以挽回，我们所能共同勉励的，就是要尽力重用一些正人君子，培养几个好官，做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。

■原文

拣选将材，必求智略深远之人，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，三者兼全，乃为上选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■解读

挑选将材，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，而且要号令严明，能耐劳苦，这三个条件都具备，就是最好的人选。

【评析】

一个处于逆境中的人，或一个想成就某种事业的人，靠单枪匹马是不行的，他必须有同伴、朋友，有辅佐他的人。因此，求才，以及如何识才、求才，就是曾国藩《挺经》的重要内容。

说到人才，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。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。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：“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？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，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，伸蹄曲膝，垂着尾巴，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，嘴和鼻子喷着白沫，大汗淋漓漓漓地直往下落。到了半山坡，它再也走不动，驾着车辕，不能向山顶爬。这时，正好碰上伯乐。伯乐一见，就从车上下来，拉着马络头哭了。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，盖在它的身上。它被感动了，就低下头喷着鼻子，抬起头发出长鸣。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，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。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？因为他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。”

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，不仅千里马常有，那些慧眼识人，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。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。商末，周族的势力大增，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。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，他的儿子姬昌即位。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，开始积蓄力量，图谋灭商。商纣王昏庸无道，整日淫逸玩乐，不听群臣劝谏，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、囚禁箕子、逼走微子。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，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闻听悲叹，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在羑里城（今河南汤阴县北部）。直到周人闳夭、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，姬昌才被放了出来，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。

姬昌回到周地后，自己称王，即周文王。文王尊老爱幼，礼贤下士，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，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，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。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。一次，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，

即太公望，又名吕尚。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，正中姬昌的心境。自此，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，训练军队，准备灭商纣王。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，治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，所以周迅速强大起来，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。周文王虽然早死，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周武王曾经为求才之事与姜太公专门展开过讨论。他问姜太公说：“选拔贤者，而却有因此危亡的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姜太公说：“选拔了贤人却不用贤人，这是只有选贤的虚名，而没有得到真正贤人的实际好处。”

周武王又说：“这种情况的错误在什么地方？”姜太公说：“这种情况的错误，在于君主只喜欢做微小的好事，没有得到真正的贤才。”

周武王说：“喜欢做微小好事的人，怎么样呢？”姜太公说：“君主爱好听赞美的话，而不厌谗言，把不好的人当做贤人，把坏人当做好人，把奸臣当做忠臣，把不守信义的人当做诚实。这样的君主把会阿谀奉承作为功劳，把敢于批评当做罪过；有功劳的人不被奖赏，有罪的人也不受处罚；结伙多的人被提拔，人数少的就被排斥，因此群臣互相结伙而蒙弊贤能，百官互相勾结而尽干坏事；忠臣因为指责君主，无罪而处死；奸臣因为会奉承君主，无功劳而受奖赏。因此他的国家各种危亡的迹象就表现出来了。”

周武王说：“好！我今天听到了批评和阿谀的情况了。”

周公，乃周文王之子，周武王之弟，名旦。他最早被封在周地（今陕西岐山县东北），因此，就称他为周公。他不但为人忠诚，且很有才能。周武王即位后，始终重用周公为辅佐。

周公跟随着周武王，历经多年征战，灭亡殷商，建立周朝。

周公受文王的影响，很早就懂得求贤才与建大业之间的关系。他地位虽极为显赫，但对待贤能之士却非常敬重。有时他正在洗头，听说有贤人求见，就马上握着湿发去会见，甚至洗一次头要中断三次。遇到吃饭时，有贤才求见，他也要赶快吐出嘴里的食物去接见，从不怠慢。有时吃一顿饭要因此中断三次。周公礼贤下士的名声传遍天下，贤能之士都愿意投奔到他的门下。

周公很尊敬军师姜太公和另一位贤能之臣召公，遇事总是虚心求教。即使他的见解正确，别人意见错误时，也从不盛气凌人，恃功自傲。

周武王临死时，委托周公辅佐他13岁的儿子诵继承王位，诵就是历史上的周成王。

周公担负起治国重任，兢兢业业，呕心沥血，与姜太公、召公等贤臣一起制订各种法令、制度，使周王朝的政权稳定。

周公既辅佐成王，留在京城，便派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受封于鲁国。临行前，周公叮咛伯禽说：“我是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的叔父，地位算是显贵了。但我还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接待贤士从不敢怠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恐怕失去天下的贤人。你到鲁国，一定要记住这条治国的基本道理！”周公把纳贤作为首要大事，这是他能够为周王朝建立功业的主要原因。

西汉武帝也以广用人才而著称，他曾下诏说：“要建不平凡的功绩，就必须依靠不平凡的人。有的马狂奔踢人，但能够日跑千里，读书人中有的被世人讥讽嘲笑，但却能建立一番功业和名声。那些狂奔乱跑不走正路的马，放荡不守礼法的读书

人，关键在于善于驾驶和使用罢了。现在命令各州郡，从小吏百姓中考察推荐有才能出众的，可以担任将相和出使远方国家的人物。”

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与贞观时代一批出类拔萃的朝臣们缔造的“贞观之治”一直被后人所讴歌。

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之一，就是广开才路，任用贤能，而在用人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计较恩仇亲疏。在贞观的朝臣中，有隋炀帝的旧臣，也有起义军的首领，有王世充的部将，也有先太子建成的谋臣。只要有是贤能的人他都予以重用。

著名的谏臣魏征，在李世民继位之前，就曾是东宫太子建成的谋臣。当时，李世民被封为秦王，他功勋卓著，人心倾归，部下人才济济。魏征深感他是建成的威胁，多次劝太子早除秦王，并亲自参与布置杀害李世民的密谋。“玄武门之变”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，夺取了皇帝的宝座。他立即召魏征到殿前问他：“当初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，在我们之间挑起祸端？”魏征从容答道：“若先太子早纳臣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”说完，昂首挺立等待杀头。众臣都以为他必死无疑，而太宗却看重魏征的卓识与才能，不但未加害，反而引为心腹，将他封为谏议大夫，以后又提为宰相。魏征也视太宗为知音，尽心辅佐，成为唐兴的栋梁之臣。

李神通是太宗的叔父，他既是当年太原起兵的将领，又是太宗的亲信。他对自己的封爵不满，向太宗抗议说：“当年太原起兵我率部响应，而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靠耍笔杆子，功劳却在我之上，我不服！”太宗说：“开始起兵时，叔父响应恐怕是为了自谋免祸。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，叔父全军覆没，

又被刘黑闥打得望风而逃。房玄龄在军帐中出谋划策，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，论功本应在叔父之上。叔父是我的至亲，对您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吝啬的，只是不能凭着私恩与功臣同赏罢了。”诸将听了都心悦诚服，认为太宗很公道。

但太宗又不是因亲埋没人才。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哥哥，外戚掌权历来是众矢之的，所以皇后和无忌本人都要求避嫌，再三请求当一个空头官，但李世民不允许，坚持任命无忌为宰相。他说：“长孙无忌才兼文武，我选拔的是人才，不是妻舅。”长孙无忌果不负李世民的重托，政绩卓著，堪称一代贤相。

由于李世民实行“量才录用，不避仇亲”的原则，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真正的治国之才，开创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唐帝国。

真正的千里马都是有一定的脾气的，他们大多清高，不乐为庸主所用，更不屑与轻视他们的人为伍，这就需要伯乐们有诚心与耐心。而历史上的成汤求伊尹。魏文侯求段干木、齐桓公五往求士、刘备三顾茅庐，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而郑成功的求才策略则更像打一个哑谜。

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，久有抗清复明之志。一日在一座石桥上摆了张桌子，上写“招贤”二字，桌上放着清水一碗，宝剑一把，灭掉的蜡烛一支，旁边还有取火用的火刀、火石和火线。围观的人都无法解这哑谜。一会儿来了个大汉，用剑对准清水狠狠劈去，碗碎水流，接着又拿起火刀、火石和火线，打火点燃了蜡烛。郑成功听了士兵的报告大喜，称赞那大汉是位深明大义的英雄。

原来，那碗清水影射清朝，劈开那碗水就表示灭清；而点燃烛火，即意味着“复明”。大汉表示“灭清复明”，正好与郑

成功的意愿相符，于是招人军中。

而曾国藩在求才时，则是什么手段都用，他根据不同对象，或结以交情，或待之以诚，或激之以情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如白圭之治，如鹰隼公扬。因此他每到一地，即广为寻访，延揽当地人才，如在江西、皖南，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。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、程鸿诏、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。与捻军作战期间，曾国藩在其所出“告示”中还特别列有“询访英贤”一条，以布告远近：“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，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。”“本部堂久历行间，求贤若渴，如有救时之策，出众之技，均准来营自行呈明，察酌录用。”“如有荐举贤才者，除赏银外，酌予保奖。借一方之人才，平一方之寇乱，生民或有苏息之日。”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，上《万言书》，并进入幕府，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。

在直隶总督任内，为广加延访，以改当地土风，曾国藩除专拟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一文广为散布外，还将人才“略分三科，令州县举报送省，其佳者以时接见，殷勤奖诱。”曾国藩与人谈话、通信，总是殷勤询问其地、其军、其部是否有人才，一旦发现，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。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。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，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，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。同时，自强自砺，“刻刻自惕”，“不敢恶规谏之言，不敢怀偷安之念，不敢妒忌贤能，不敢排斥异己，庶几借此微诚，少补于拙。”从其一生的实践看，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。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，幕府之盛，自古罕见，求才之诚，罕有其匹，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。

三是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，“得一而可得其余”。

曾国藩说：求才“又如蚨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类相求，以气相引，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”。

蚨，即青蚨，是类似虫的一种小动物。“生子必依草叶，大如蚕子。取其子，母即飞来，不以远近。……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，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，每市物，或先用子钱，或先用母钱。皆复飞归，轮转无已。”“雉之有媒”，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，家雉能招致野雉，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，使之结伴而来，接踵而至，收“得一而可及其余”之效。

曾国藩求才如渴，每与人通信，交谈，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。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，方宗诚、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。吴汝纶也是安徽人，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。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。李兴锐是李竹语推荐。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。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。容闳则是李善兰、张斯桂、赵烈文三人推荐的。向师隽是严仙舫推荐的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三月，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，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。曾国藩复信中乃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，指出：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，“颇有人才渊藪之称；实则岩搜石采，楚材晋用，而故山反为之一空。阁下莅湘初政，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。……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，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。方今四方多难，纲纪紊乱，将欲维持成法，似仍须引用正人，随事纳之准绳，庶不泥于例，而又不悖于理。”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：“湘中统将，多宜力于外省，本境反有乏才之叹。不特阁下用此为虑，鄙人亦增内顾之忧。兵

可以磨炼而成，欲求将才之辈出，不能为未雨之绸缎。”

咸丰十年冬，因侵略者侵占北京，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，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。京官具奏者甚多，湖北、河南、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，众口一声，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。唯曾国藩称，“有人则可秦可桀，均足自立，无人则桀失而秦亦未必得。”他根据历史故实，进一步论述道：“中兴在乎得人，不在乎得地。汉迁许都而亡，晋迁金陵而存。拓跋迁云中而兴，迁洛阳而衰。唐明皇、德宗再迁而皆振，僖宗、昭宗再迁而遂灭。宋迁临安而盛昌，金迁蔡州而沦胥。大抵有忧亦勤之君，贤劳之臣，迁亦可保，不迁亦可保，无其君，无其臣，迁亦可危，不迁亦可危。鄙人阅历世变，但觉除得人之外，无一事可恃也。”

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，与郭嵩焘、刘蓉深交。任京官时，又广交朋友，以文会友，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、倭艮峰外，其他如吴竹如、窦兰泉、冯树堂、吴子序、邵蕙西等友人，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。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。他记载道：“又有王少鹤、朱廉甫、吴莘畬、庞作人。此四君者，皆闻予名而先来拜。虽所造有深浅，然皆有志之士，不甘居于庸碌者也。”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。他在礼部复试时，因欣赏“花落春仍在”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，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，后来，他们对曾国藩的“事业”都有过很大的帮助，特别是陈士杰。曾国藩交友的目的很明确：“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；‘师友夹持，儒夫亦有立志’”。

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，是能够成功他的“事业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一点，早已是人们的共识。李鸿章作《曾

文正公神道碑)，称誉他“持己所学，陶铸群伦。雍培浸灌，为国得人……知人之鉴，并世无论。万众一心，贯虹食昴。终奠九士，踣此狂丑。”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。后来，薛福成评述道：“自昔多事之秋，无不以贤才之众寡，判功效之广狭。曾国藩知人之鉴，超轶古今。或邂逅于风尘之中，一见以为伟器；或物色于形迹之表，确然许为异材。平日持议，常谓天下至大。事变至殷，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。故其振拔幽滞，宏奖人杰，尤属不遗余力。”《清史稿》评论曾国藩道：“至功成名立，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，疆臣阃帅，几遍海内。以人事君，皆能不负所知。”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“虽不以善战名，而能识拔贤将，规画精严，无间可寻。大帅如此，实起事以来所未覩也。”

曾国藩提出“取人之式”以有操守、多条理为主，那么古贤对此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？

春秋时期，齐宣王问孟子：“怎样去识别那些缺乏才能的人而舍弃他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国君选拔贤人，如果迫不得已要用新进，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，把疏远的人提拔在亲近的人之上，对这种事能不慎重吗？因此，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，不可轻信；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，也不可轻信；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，也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，然后去了解，发现他真有才干，再任用他。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不好，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，然后去了解，发现他真不好，再罢免他。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可杀，也不要听信；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可杀，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听说某人可杀，然后去了解，发现他该杀，再杀他。这样，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。”